

城市环境艺术

广州环境艺术的发展

城市雕塑
城市广场
城市公园
城市交通
城市夜景
城市美学
城市旅游环境
城市居住环境
城市自然环境
城市商业环境

主 编：成 涛

副主编：宣新明 胡 翥 杨宏烈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城市环境艺术

——广州环境艺术的发展

主 编 成涛

副主编 宣新明 胡潇 杨宏烈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环境艺术——广州环境艺术的发展/成涛主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8
ISBN 7-5623-1563-9

- I. 城…
- II. 成…
- III. 城市环境-建筑设计-概况-广州
- IV. TU984.2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6092 号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五山 邮编 510640)

责任编辑 赖淑华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装

*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彩插: 2 字数: 321 千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36.00 元

前言

城市环境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它涉及到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的法规，又涉及到城市设计和城市艺术。可以说，城市的历史、城市的自然环境、城市交通、广场、雕塑、城市公园、城市商业环境和人居环境等都溶入了城市环境的实质内容之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环境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据最近《羊城晚报》报道：老百姓埋怨“高架桥挡了艳阳天”；埋怨现在许多建筑“一个模子连狗都找不到家”；广州人大代表对麓湖风景名胜地建别墅提出了质询。这说明城市环境的问题已牵动了千家万户。老百姓购房的主要动机已由满足居住功能逐步转向改善环境，生活用水质量和空气质量、城市噪音等等都成了老百姓关心的热门话题。面对城市环境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国的各个城市相应制定了各自发展的策略：北京的一些专家提出北京不宜多建塔式高层住房；深圳提出在城区不建高架桥；济南禁止摩托车上牌；广州提出“发展卫星城，建设大广州”。

广州是中国南方的一座大城市，她的城市建设的辉煌、喜悦、展望与苦恼、缺陷、遗憾、误导等并存起来，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画。这并非只是中国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许多城市面临的境况。为此，《城市环境艺术——广州环境艺术的发展》一书从城市自然环境、人居环境、城市公园、商业环境、城市夜环境、城市环境保护以及城市的广场、交通、雕塑等方面出发对城市环境艺术进行研究。

《城市环境艺术——广州环境艺术的发展》一书是华南建设学院等单位的十几位专家教授长期苦心研究城市环境的成果。该书第一章“广州城市环境发展简史”由吴乾钊高级工程师和杨宏烈教授执笔；第二章“城市自然环境”由成涛副教授执笔；第三章“城市环境的美学建构”由胡潇教授执笔；第四章“居住环境”由黄镇梁副教授执笔；第五章“城市雕塑的方位”由许志强老师执笔；第六章“城市公园”由成涛副教授、杨宏烈教授和傅冠长同志执笔；第七章“城市交通与环境”由陈立新讲师执笔；第八章“城市广场”由宣新明副教授执笔；第九章“城市商业环境”由霍维国教授执笔；第十章“旅游景观的建构与开发理念”由杨宏烈教授执笔；第十一章“城市夜间景观”由王健博士执笔；第十二章“城市环境的保护”由王筱虹讲师执笔。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华南建设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许育民，广州市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傅冠长总经理等领导和专家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广东省政协朱森林主任在百忙中为本书题词，特此致谢。

成 涛

2000年6月

第一章 广州城市环境发展简史

广州是一座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历来为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广州城市环境艺术发展史是一部集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山水文化、园林艺术、民族风情之大成的社会发展史。如果说“城市环境艺术专业”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开拓的崭新领域的话，城市环境艺术则是一种渊深源长的文化意识。^①

人类对居住环境的审美意识已经经历了好几个阶段。^②最初是对原始环境美的崇拜，人们对人居环境中原始的山川湖泊的神灵之美充满了向往。“万物有灵”就是人们对这种原始文化的认识。游牧时代，人们对环境的审美认识是实用主义的，习惯上利用自然环境作为畋猎、渔樵、林果、游娱的场所，对自然美的欣赏不占主要地位，反而对鱼类猎物等对象之美较为看重。因此，这些场所实际上主要是作为猎场、牧场、田庄和娱乐场而存在的。

农业时代，环境艺术的标准是和谐之美。它追求自然美和人造美的融合，让人造物向自然延伸和让自然物向人造物渗透。如《诗经》、《楚辞》就细笔重彩地描绘了稻粱黍粟之美及宫室与花木水体的有机联系。“天人合一”、“天下为庐”就是这一时期人们的空间环境观念的高度概括。

随后，“情景交融”和尺度美成了人们对环境艺术深层内涵的追求。一方面有意识地去发现那些能够唤起人类美感的自然风景，并加以保护和点缀；另一方面有意识地赋予人造环境某种艺术内涵，去领略不同的形式美。表之于文字，则为山水诗文；表之于绘画则为山水画；表之于现实生活，则为山居岩栖、隐逸江湖、寄情山水。古代山水旅行家的涌现，古代园林艺术的蓬勃发展，即为最好的实证。

工业时代初期，出现了环境美学意识向两极高度发展的现象。中国人追求“虽为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美，西方人追求“人定胜天”、几何修剪的人工美。

近代社会，城市讲究公共环境美，市区有公园、建筑有庭院、街道有花坛，追求居住别墅有机化、自然环境人性化。

现代哲学化的环境多用抽象手法建造，其中硬质景观明显增多，浪漫的、感性的东西日趋减少，实不如自然景观元素的大众化和具有亲切感。

人们要求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环境能向人们传播丰富的历史信息，能向人们叙述城市的思想主题。人们不仅仅满足于生存物质的富裕和表层消息变化的享用，更不希望出现那种低层次非人性、非人尺度被污染的环境。^③作为一个像广州这样的历史名城的公民和外来游客，理所当然追求的是具有历史文化深层次心理感情的交流和陶冶，追求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平衡、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人类城市环境一般共同性的发展规律,寓于每一个体城市具体的发展特质之中。广州城市环境的形成与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本章将从自然山水的沧桑、城池街巷的演变、市井商肆的兴衰、规划布局的造诣、建筑文化的艺术积淀、岭南园林的构筑意境等方面对广州城市环境艺术的发展史进行初步的探讨,以使后面各章对各类环境艺术的研究,有一个扎根本土、吸取南粤大地母亲乳汁的共同脉络。

一、天地神工,沧桑巨变

广州在两亿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到了距今一亿五千万年,也就是被称作中生代侏罗纪的时候,由于地壳运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块缓缓上升,由海洋演变成陆地。燕山期的造山运动,形成了现在的九连山、南昆山、罗浮山等山脉。山势延绵,一直辐射到广州市郊,变成低山丘陵,成了我们的白云山、越秀山。到了离现在1亿年左右的白垩纪,广州这个地方雨水充沛,森林茂盛,到处是洼地、沼泽,气候湿润闷热,构成了爬行类动物栖息繁衍的优良环境。1998年,在越秀区吉祥路旁边的地底白垩系地层发现了四窝恐龙蛋化石和大量零散蛋壳,可见广州在远古时代,曾有过一段像电影《侏罗纪公园》描绘的恐龙世界时期。

到了距今200万~300万年前的第三纪,发生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广州地区许多由红色岩系组成的岗地、台地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珠江的北面有红花岗、东山岗、石牌岗、南面有赤岗、鹭江、小港、南石头等。而珠江南面的漱珠岗则是一座古火山,为流纹岩所组成。这一大片岗地、台地,地势平坦,地基坚实,形成了城市建设良好的地质条件。

在广州海珠区石指岗以北的七星岗南坡,有一大片裸露的第三纪红色岩系砾岩。崖高约2米,石崖下部有一连串的半米深的凹洞,使上部额状突出。石崖的前方则是一大片宽敞的平地。1937年5月,经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吴尚时教授考证,石崖下部的洞,是由于海浪拍岸侵蚀而形成的,这是一处古海岸址。而今,海岸已向前推移了约100公里。站在这些浪蚀洞前,我们仿佛可以听到五六千年前海浪拍岸的阵阵涛声。即使如砾岩这么坚硬的岩石,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海浪拍击冲蚀下,也被塑造成这种典型的海岸地貌。崖前的海滩,演变为宽阔的海蚀平台,岸线前移以后,岗前变成了一片原野平畴,完成了从沧海到桑田的巨变。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自然环境,是指城市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各样先天形成的和后天人工改造形成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先天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它包括洁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必要的土地和活动空间、周围的山川湖泊、矿产、动植物资源等。尽管人类的生活方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因素仍按其自身的自然规律发展。人工环境,是人类为了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原有的自然环境基础上经过人工改造而形成的环境,包括有城市、街道、房屋、娱乐场所、农作、工业、交通、文化古迹和风景名胜等。这些人工环境的形成和自然规律密切相关,但人为因素对它们的影响更大。城市环境艺术主要是从对人工环境的塑造中提炼出来的。城市环境艺术的指导思想,直接影响着城市文化品位。

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广州这块土地上从事渔猎和原始农业等生

产活动。在龙眼洞、飞鹅岭、新市等丘陵地带曾陆续发现有远古文化遗址和出土了大量的印纹陶片、石斧、石斧、石箭、石网坠等磨光石器，有用骨、角、蚌、蚌等制成的工具和装饰品，另有大量淡水、半咸水动物和陆栖动物的遗骸。这说明位于珠江三角洲边缘的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开发。流动的渔猎部落逐渐定居下来从事农、牧业，这是先人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一个地方从有人口聚居到形成村落直至发展为城镇的起点。

秦始皇 33 年，广州所在地的番山、禺山与任嚣城两两结合，相得益彰，山、城十分协调和谐。《番禺杂志》记载：“一军驻番禺之都。”一军 10 万人，这说明广州当时拥有供 10 万人口居住的良好环境。司马迁的《史记》亦称这里为南方海滨一大“都会”。东汉献帝建安 15 年（公元 210 年），东吴交州刺史步骘“重理尉佗旧治”，“见土地形势……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之地，宜为都邑”。后来下令削平番山，“扩番山之北以广故城”（《水经注》）。从此以后，广州周围的山丘、岗地、涌溪、森林等自然要素逐年消失，变为城市用地。唐时从白云山流下的甘溪被填。五代刘岩于后梁贞明三年下令铲平禺山、坡山，增建南城，称“新南城”；人工开凿的西湖当时已成南官宫苑内地（今市教育局处）。明代《普渡庵记》曾将广州珠江南岸的地貌描绘为“内藏小海，外接大洋”。“小海”指河汊，“大洋”指南海。可见当时海洋已远离广州市区。

珠江是广州的母亲河。珠江的变迁，也记录着广州市区的发展过程。晋代，今惠福西路五仙观前是珠江边的一个渡口，距现在江岸边约 1 100 米；南北朝时期，江岸延伸到华林寺前的西来初地，距今江岸约 900 米；隋朝又南移至今杨仁里一带，距今江岸 800 米；到了唐代，珠江岸线约在西关泮塘、上下九、大德路、文明路一线以南，距今江岸约 700 米；宋代是珠江淤积较快的时期，宋末岸线已达一德路、万福路一带；元明两代，城西江岸移至和平路，城东江岸移至东华路以南；清代道光年间，珠江北岸已推移到西濠二马路；再过了 50 年，到了 20 世纪初，现在的珠江北岸雏形才基本形成；1931 年，长堤一带填为陆地，把海珠石并入北岸。自此，著名的广州珠江“三石”——海珠石、海印石、浮丘石（三个江中石岛）俱成史迹。

珠江江面晋代宽达 1 500 米，到唐代变为 1 400 米，宋代为 900 米，明代为 700 米，清朝为 500 米。到今天，珠江最宽处约 400 米，最窄处仅 180 米。^④2000 多年来，珠江岸线加速变窄，广州城区加速扩展。

二、“城”的演变，“市”的发展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择水而聚，依山而立”的道理，一是为了方便生产和生活，二是为了安全。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任命任嚣为南海郡尉。任嚣在今仓边路以西的古番山和禺山上建筑了番禺城，俗称“任嚣城”。此为广州建城之始。任嚣建城，十分重视对环境资料的利用。当时，珠江宽阔，海岸很近，咸潮可涌至番禺城下。番山的东侧，即现仓边路是一条源自白云山名叫甘溪的古溪流。任嚣依山傍水筑城，既可防御外敌入侵和免受水淹，又便于取得甘溪的淡水。公元前 206 年，赵佗建立了南越国，扩建番禺城，城周

十里。后人称赵佗城“负山带海”。“山”就是指越秀山，“海”即指当时水面宽阔的珠江。赵佗的建城思想和任嚣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山四路发现的南越王宫署和后花园遗址，展示了当年南越国王宫的建设成就，其布局遵循中原体制，建筑水平可与中原相媲美。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也说明当时渔业、造船业和航行技术已较发达，人民善于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生产。

中国古代的“城”和“市”，有着紧密联系但又不互相同等。“城”是指用城墙围筑起来，用于防守保护的聚居区域。城墙之外，还有护城河。城墙高耸，城门紧闭，易守难攻。所谓“深如城府”、“固若金汤”、“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都反映了古代建城以突出防御功能为主。“市”则指产品交换、物资交流的场所。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形容古代城市所具有的交易集散性和流动性的特点。那时候“城”和“市”是分离的，任嚣和赵佗对环境自然条件的利用，更多地考虑在“城”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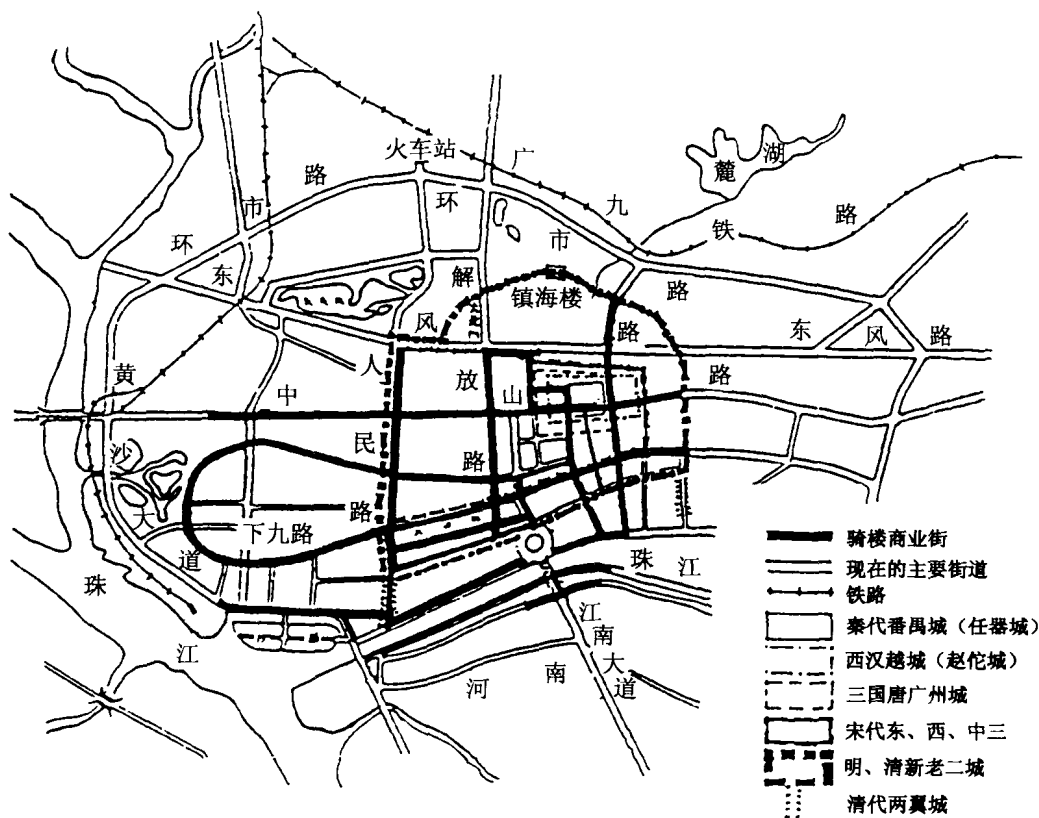


图 1-1 各时期广州城的分布图

到了隋唐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 594 年，隋文帝下诏在扶胥镇，即今黄埔庙头，兴建南海神庙，使汉代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经过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为兴盛的时期。唐代扶胥成了广州外港，船舶云集，商贸发达。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事务。随着大批阿拉伯人的到来，伊斯兰教传入广州，在广州的内

港附近建立怀圣寺和光塔。内港有光塔引航，更加繁盛。后来，地方官在附近为外国侨民开辟居住区——“蕃坊”。今流花湖附近，是唐代广州的另一重要内港，称为兰湖码头。由佛山、北江、西江来广州者，多在兰湖码头上岸。一来此地离城较近，便于入城，二来靠近象岗，是船舶避风之所。唐代广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具备了中国第一大港的城市功能。当时尽管港口、码头、“蕃坊”还在“城”外，但经营交易和货物交流已遍及城内外。“城”和“市”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逐步联结、融合，走向一体。^⑤

宋初珠江江岸在西关和玉带濠一带，宋末岸线已推移至一德路、万福路，宋代的江面比唐代的江面缩窄了 500 米。珠江三角洲一带围堤筑坝、兴修水利，使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有余粮供应福建、浙江等地，广州成了一个大米市。加上附近蔗糖、棉布、陶瓷生产的发展，广州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和最大的对外通商港口。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需要。公元 1072 年，广州扩大城区，建成中城、东城和西城，三城东西相连，其中西城就是为了保护新发展的商业区而建的。“城”与“市”已浑然一体。元代初期，大毁天下城垣；1278 年（元至 15 年）广州城墙被拆；1293 年（元至 30 年）始修复。

明、清两代，广州城廓又进一步扩展，形成了老城、新城，后来又增筑瓮城、月城、



图 1-2 清末年间广州鸟瞰图

翼城，城墙不断延续。明代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大规模扩大老城：一是将宋元时期的三城合一，二是扩大北城，三是扩展东城。洪武七年（公元1347年）扩大北城，向北跨到了越秀山（当时称越台山或观音山）。现存雄伟的五层镇海楼就是当时的北城门楼。“青山半入城，六脉（渠）皆通海（珠江）”即广州古城的基本结构。今天广州城内的主街多为明代已有。^⑤清顺治四年（1647年）冬，在新城之南，增修东西两翼城，直至珠江边，各长20丈（66.67米），俗称鸡翼城。后来，西关大片民居兴建，即成今宝华路、逢源路等城区。泮塘以东，洗马涌以南地区由20多个村演变为手工业作坊区，建有一批机房。东关则沿江伸到过去元监街一带。光绪十二年（1886年），广州天字码头堤岸筑起了第一条40米的马路，并兴建了一些市政设施。

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城墙的防御功能已明显削弱，而它的阻隔性、封闭性又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市民的出行和货物的流通。1918年10月，广州设立了市政公所，开始拆城墙、筑马路。1920年，广州古老的城墙、城楼、城基基本上全部被拆除，变成无“城”之市，分布全市的富有地理性特色的骑楼商住街构成了广州整体风貌，并延传至今。“城”、“市”的发展演变过程，深刻地改变了广州的城市环境。但古老城墙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旅游景观价值是永存的。在某些有意义的地段，城墙、城楼、瓮城、城门等有纪念性、观赏性的遗址、遗物、遗构，还需要加以保护、维修，使之在城市发展的环境艺术中发挥作用。

三、规划布局，善用资源

城市布局是城市环境艺术的一种宏观体现。所谓“山川秀美、景物天成”，“背山面海、虎踞龙盘”，“博大精深、气度恢宏”，既是对城市的总体描述，也是对城市环境艺术特色的赞美。城市布局应该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城市功能的要求来确定的，布局合理是善用资源的表现。

早在广州建城之初，任嚣就十分重视城址的选择和布局。整座城市的形势，北负越秀山，南面珠江小海，东靠古甘溪，颇合中原勘察术中“藏风得水”、“背靠来龙，前有曲水”、“左青龙、右白虎”的基本原则。秦汉以来的历代城市建设，已在布局上十分重视功能分区。早期的官衙多集中在现中山四路以北，所建的城垣主要是为了保护官署。商业区则多在城外。两晋南北朝时期，先人已十分懂得善用珠江水路，将黄埔庙头建为远洋大港，开辟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城西的坡山古渡和西来初地，是当时颇为兴旺的内港。隋唐时期，广州城已注意把现北京路作为城市的中轴线。平衡、对称的理念，在城市环境艺术中已占有重要位置。

在封建社会中，商贾的地位是不高的。城内的“市”聚散的特点比较突出。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的主要商业区通常设在城外。唐代外贸繁盛，大批阿拉伯人到来，朝廷在此地设“蕃坊”，形成了外国商人聚居和从事外贸活动的商业中心区。延至宋代，为保护新发展的商业区和居民，扩建了两城。随着珠江岸线的再移，主要内港移到了南濠街一带。由港口带出的外贸码头商业区移到今惠福西一带，但还是在城外。这种官署、学宫、军衙等位于城内、商贸位于城外的布局，一直沿习到清朝，其间虽经几次扩城，但这种布局格调基本没有改变。

从历史上看,港口和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港口牵动了广州城市发展的方向。清代以前主要是内港的牵动作用。汉代的泥城,晋朝的西来,唐代的光塔、兰湖,宋代的大通、西澳,这些内港都是位于城的西边,比城东的琶洲、东澳规模要大。广州的对外贸易区自光塔寺始向南濠、下西关、十三行、沙面方向迁移,牵动整座城市向西发展。清朝咸丰年间,沙面成了英法租界,商业贸易促进工业的发展,西关一带平农田、开厂房、辟街道,形成纺织工业区。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住宅建设的发展。富商在西关聚集,形成了晚清西关大屋的特色。西关的发展过程,是广州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①

1921年,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提出建设“南方大港”的计划。孙中山把建设“南方大港”的位置选在黄埔深水湾一带,规划建设一个从黄埔到佛山的新广州。新广州的商业区规划在河南岛,工业区分布在花地和佛山之间,码头在黄埔而后航道一带建设,旨在把广州建设成一座功能分区明晰的花园城市。

1932年,当时的广州市政府颁布《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特别强调城市的功能布局。《草案》把全市城域划分为工业、住宅、商业、混合等四个功能区。其中工业分布在临江一带,如西村、石围塘东南部、牛角围、牛牯沙、罗冲围等处。原有的商业区在旧城区内,新辟的商业区设在黄沙铁路以东,河南西北部,东山以东,省府合署地以西一带。住宅区分两种,一是风景优美的住宅区,分布在河南中、北部,东山以东一带及车陂东部,白云山至飞鹅岭之东南麓等处;二是工人住宅区,主要分布在工业区毗邻的地方,如市西洋塘及芳村茶滘等地。规划黄埔为广州外港,白鹅潭一带为内港,新水厂拟定在西北松溪,新电厂在西村;经牛牯沙岛(大坦沙)造两座跨江桥梁接通粤汉、广三两铁路,新客运站设在西村省立一中东南;民用机场设在南琶洲塔以东。这个《概要草案》对当时广州城市建设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并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广州城市建设与规划过程中,还有一段插曲不应该被世人遗忘,其中许多先进的手法和优秀的规划成果至今还值得我们参考借鉴。这就是广州城市规划建设区域范围内的一个有机部分——沙面租界领事馆区的规划建设。

沙面乃位于广州市中心区西南、珠江白鹅潭畔的一个小岛,始称拾翠洲、中流沙,面积0.3平方公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面沦为英法租界。东段1/5为法租界,西段4/5为英租界。英法虽各霸一方,但有一个比较统一完整的建设规划。规划用一条贯通东西的主要道路,辅以几条纵向次道将其分割成大小不等的12个区块,各个区块又划分为若干个小区块。其间道路与绿化设施相结合,并占了相当大的面积。沙面南端因靠近珠江水面,宜于观赏活动,故规划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各区块有绿化分隔,相对独立,使各国领事馆及其银行等有关建筑互不干扰,又融为一个整体。沙面的供水、供电、治理河涌等市政设施也是当时广州最齐全、最先进完善的。

现沙面建筑几乎都是19世纪末兴建的西洋式建筑,虽建造年代相距不远,但建筑风格不尽相同,种类也颇多。它们当中有领事馆等政治性建筑,也有教堂、学校等宗教文化性建筑和银行、洋行、俱乐部、旅馆等商务办公、休闲、娱乐性建筑,还有许多小住宅建筑。尽管如此,整个小岛的建筑环境却是相当和谐的。沙面西洋建筑的移入,带来了西方建筑的风格体系,也体现出了结合广州气候特点进行规划设计建设的技术与艺术成就。

规划是建设良好城市环境的关键。白云山作为广州城市的“肺”,流溪河作为广州重

要水源命脉，必须加以规划保护。总结历代规划的经验成果，今天的广州市区不宜向北发展，以保护好仅剩存的白云山生态山林与污染尚轻的流溪河水源。从城市防灾角度分析，广州城区也不宜向北发展。

有不少专家指出，^⑧珠江三角洲地区自文明蒙初以来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是洪水与台风，其中，西江与北江洪水长期危害珠三角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广州西部与北部地区至今仍然暴露在西北江的洪泛区域内。1915年7月，大水曾使当今的解放路以西，环市路以北，白云山以西的广麦地区全部受淹，而东部地区由于地势较高，除沿珠江一线外，基本上免于洪患，广九路直至石龙段也完好无损。现西北江虽有一定水利防洪设施，但特大洪灾发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是因为：①流域水土流失使北江河床逐年升高，只要较小的洪峰流量就能打破历史最高水位记录；②珠三角联围筑闸与城市化导致河汉填高，河网密度减小，从而减缓了泄洪速度；③全球气候环境反常，流域洪水更趋暴虐；④西北江流域的城市化发展导致河川径流系数成倍增加，从而增大洪水水位；⑤广州地处河口，上游洪水一旦与台风暴潮相遇，将大大延长洪峰高水位时间。古代广州城址之所以能够历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地处地势较高的番山、禺山、越秀山（今越华路一带），地基条件较好。

从地质安全方面考虑，广州城区也不宜向北发展。广州北部地区属广花平原隐伏岩溶地貌，尽管石灰岩未露出地面，但在-80米以上分布有众多溶洞，尤其-30米以内广泛分布半充填或无充填溶洞。20世纪70年代江村花都一些水厂开采地下水时就出现过地势沉降、危及建筑安全的问题。据报道，赤坭—江高隐伏岩溶区覆盖了广州北部石井以北地区，该地区的地裂缝、地陷隐患较大，目前已列入广东省的七大地质灾害防护区。此外，向北发展形成的“L”形城市结构也会给交通联系带来困难。

四、建筑文化，源远流长

建筑是构成城市环境最重要的人文因素。任何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紧密相联的，是城市文脉的表现和延续。有人说：建筑是凝聚的文化，无声的史诗。建筑反映了城市的文化品位，是城市形象的直接体现。

广州建城已有2210年的历史，在悠悠的历史岁月中，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形成了蜚声中外的岭南建筑艺术风格。作为华夏文化的一脉支流，岭南文化—岭南建筑具有其浓烈的地方气息和鲜明的南方风格。

岭南建筑，有别于“京津”、“江浙”、“云贵”、“甘蒙”的建筑特征，它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产生和发展起来，适应于华南建筑地区气候环境要求的建筑体系。岭南建筑语言独特，词汇丰富，围绕满足岭南地区隔热、遮阳、通风、防潮四大基本功能的要求，织造了一篇篇精妙的华章。大雨蓬、深阳台、挑檐、骑楼、凹廊、彩玻、花窗、琉璃檐顶，是岭南建筑的主要词汇；简洁明快，轻巧飘逸，是岭南建筑大致的色彩特征和外观形象；精雕细刻，演绎典故，华丽传神，是岭南建筑细部装饰的主要特色。秦汉、唐宋、明清和清末民初是岭南建筑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

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大批军民南下，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大融合。在广州汉墓中出土的不少陶屋模型，反映了秦汉时代中原的两坡瓦盖、木柱梁架结构已传入岭南，“干栏式”、“曲尺式”、“楼阁式”、“三合式”等各种类型的建筑已经比较普遍；在南越宫署遗址

中,出土有瓦当、栏杆、铺地阶砖等建筑构件;在后花苑遗址中发现的排水渠和其他石构建筑,说明秦汉时期中原的建筑技艺已在岭南广为推广。据考证,当时筑城多采用板筑法,宫殿为防潮,多建于高台上,墙体构造大致为木骨泥墙、板墙或土坯墙。木构技术已相当成熟,不仅应用于单层房屋,而且开始建造楼阁。在夯土的基础上,已开始掌握使用砖、瓦、木、石等多种建材的技术。建筑装饰也已广泛应用,梁、柱、斗拱、门窗、屋顶等都有多种彩绘、雕塑或多种图案纹样。从建筑体量、尺度、开间、大门、门阙、塔楼、屋脊的装饰上,可以体现建筑物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广州的古建筑既保持了中原古代建筑的许多优秀特色,又结合岭南的气候、文化和环境特征,在结构、用料、装饰等方面予以创新,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

由于年代久远,广州秦汉时期的地面建筑已无遗存,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文献记载等对它进行了解和认识。现存的古建筑主要是唐宋以后的,尤以明清时代居多,这些古建筑主要有五类:

①城墙楼阁和古宫苑遗址。有秦代船台遗址,西汉南越王宫苑遗址,五代时期的药洲遗址,宋城墙遗址,明代越秀的城墙、镇海楼、岭南第一楼等。

②寺塔、庙观。有佛教的光孝寺、六榕寺和花塔、大佛寺、海幢寺、华林寺等和能仁寺遗址;道教的八仙观、三元宫、纯阳观、仁威庙等;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和光塔、濠畔街清真寺等。还有隋开皇年间始建的南海神庙、明代的琶洲塔、赤岗塔等。

③学宫、书院、祠堂、会馆。主要是明清期间的建筑。有番禺学宫、南海学宫、陈家祠、何家祠、万木草堂、广雅书院等。

④古园林私宅。有小画舫斋、余荫山房、十香园等。

⑤陵墓建筑。有象岗山南越王墓、清真先贤古墓等。

唐宋时期,岭南政局相对稳定,对外贸易有较大发展,华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包容和消化在岭南地区得到充分的表现。唐宋时期能够流传至今的代表建筑主要是寺庙。始建于隋开皇年间的南海神庙,唐代以后历朝均有重修、扩建,但其平面型制仍保存唐风没变,为全国之少见。古时庙前有码头,海船进出,必向南海神祭拜。每年朝廷都派有官员代表举行祭典。庙前的石碑坊,刻有“海不扬波”四字,就反映了船员祈求平安的意愿。庙内尚存唐朝韩愈碑、宋开宝碑、明太祖御碑、东汉的大铜鼓、明代的铁钟和玉刻南海神印等文物。庙西章丘顶上有浴日亭、单檐歇山顶,梁架简洁,昔为观望海上日出之地。宋人称浴日亭“前鉴大海,茫然无际”,清人描写扶胥日出“火云一烧,天海皆赤”。“扶胥浴日”是宋、元、清三代的羊城八景之一。

光孝寺历史悠久、规模宏伟。自东晋起,不少印度、南亚高僧前来传教译经,南宋时已成为岭南名刹。该寺大雄宝殿为东晋年间始建,后历代均有扩修,现大殿仍保留着南宋的建筑风格。梁架为抬梁与穿斗式相结合,较多地保留了岭南早期木构建筑的工艺特色。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九脊殿顶,为岭南最雄伟巍峨的殿堂。古时光孝寺“方圆十二三里”。寺内诃子、菩提、榕树婆娑,环境清幽开阔。

宋代的六榕寺和花塔,是广州又一著名佛教文物古迹。花塔屹立寺院中央,是一座八角九级的楼阁式砖木塔,朱栏碧瓦,丹柱粉墙。每两级间设暗层,明暗共十七层。楼梯作穿塔壁绕平座式,并具暗层通风导光功能。塔东的天王殿,檐栏外出两跳插拱承托挑檐梁,碌灰筒素瓦,硬山顶,保存了明代的建筑风格。观音殿四角重檐对称,脊上双龙飞

舞、廊庑怀抱，雕梁画栋，脊角、窗牖玲珑典雅，充分体现了岭南建筑轻巧飘逸的特色。

在广州，明清遗留至今最有代表性的建筑莫过于学宫书院，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陈家祠。陈家祠又名陈氏书院，建于清光绪年间。主体建筑座北朝南，前后三进，各厅堂、庭院按中轴对称依次布列，相互间以廊庑联通。厅堂、廊庑、斋室、厢房等建筑中广泛采用了木雕、石雕、砖雕、陶塑、灰塑、铁铸等不同风格的工艺做装饰。每座房子从柱础到瓦脊，均以梅兰菊竹、花鸟虫鱼、岭南佳果、历史典故、地方风物等题材为装饰内容，用料讲究，精雕细刻，把晚清时期的建筑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廊庑贯通全院，挡风遮阳，房舍高大阴凉，内外庭院满目苍翠，幽雅宜人，正适合广州亚热带气候环境的需要，极尽岭南建筑格调之精妙。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居住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的好坏，对人的体质和智力发展均有重大影响。因此在建造时既要考虑实用性，又要讲究地方特色。广州最有特色的民居，当数竹筒屋和西关大屋。

清代广州的民居多采用青砖石脚的墙壁，碌灰筒白泥瓦屋顶，黑色或深色桁条、桷板、厅窗，并以大阶砖白泥方砖铺地。如此设计，虽色调淡雅却显得端庄沉实，使得在亚热带炎热的气候中透出清爽之意。广州数量较多的传统民居，多以单间纵向发展的布局出现，面狭而进间大，由头厅至头房、二厅、二房，中间以天井相隔，各厅房靠室内一侧的巷道相通，故而被称为竹筒屋。这种竹筒屋，通风、采光、排水及交通主要靠天井和巷道解决。在这种居屋中，常常是一屋多户。竹筒屋一般隔墙相连、隔巷相对，营造了街坊邻里朝夕相见、互为唇齿、富于人情味的岭南民俗民风。

西关大屋，是清末民初时期的豪门富绅在广州西关一带所建造的传统民居，从建筑平面布局、立面构成到细部装饰都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风格。西关大屋的平面布局基本上是纵深发展，三间西廊，左右对称。中间为主要厅堂，每厅一进，厅之间用小天井分隔，有小屋盖，靠高侧窗或天窗导光通风。正间两旁为书房、偏厅、卧室和楼梯间。大屋两侧，各有一条青云巷。门面装修十分讲究，两侧均为高级水磨清砖墙，显得高雅大方。门口设矮脚吊扇门、趟枕、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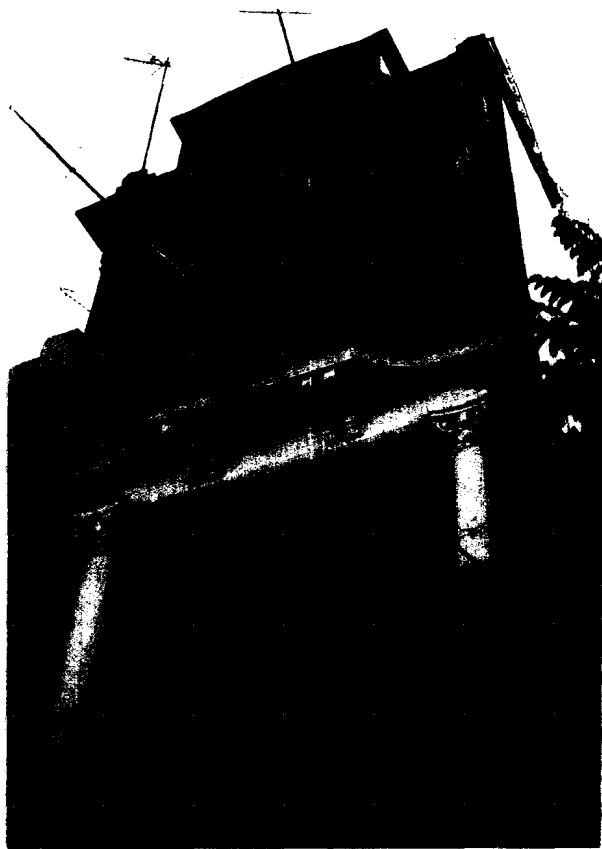


图 1-3 广州近代民居融会了西方建筑风格

装修十分讲究，两侧均为高级水磨清砖墙，显得高雅大方。门口设矮脚吊扇门、趟枕、硬

木大门等三重门扇，作通风和安全保证。室内陈设名贵典雅红木家具，配以精巧的木雕花饰，装嵌着彩色玻璃的满州窗。

西关大屋的设计很注意改善环境条件。四周封闭式外墙可以避免太阳热辐射和噪音的影响。青云巷加速自然通风，给人一股清凉感觉，适应广州亚热带气候特征。装饰集当时工艺美术之大成，消化吸收外来文化。重点装饰门面和外墙，看不到的部位一般不作装饰，很能反映广州人务实、讲求实惠的观念。西关大屋是清末民初低层高密度住宅的典范之作，也反映了当时城市人口逐渐稠密的环境对城市建筑的要求。

广州近代的居住建筑，包括东山区的官邸式别墅建筑（俗称“东山别墅”，为独立式小洋楼），其周围绿树环绕，地基随山因势布置，建筑造型各具特色，属于一种园林化的生态环境，值得当今学习与借鉴。

另外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利用的是广州建筑艺术与城市规划圆满结合的骑楼商住建筑和骑楼商业街。分布全城的骑楼商业街的营造活动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今天依然有发展前途。究其缘由：骑楼适应南方的气候特点，无论是暴雨袭击还是烈日曝晒，都为商家与顾客提供一个全天候的购物环境。无论是阻挡台风刮落物还是避免马路车辆干扰，骑楼都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公共活动场所。这样一个室内、室外过度虚空间，还可丰富并促进人们的交往和逛街情趣，是真正受老百姓喜爱的城市环境艺术空间。无论是在高层楼房还是在低层住宅，无论是商业建筑、办公建筑还是文化建筑、医疗建筑等都可接受骑楼这种建筑空间模式。如今新型先进的建筑材料与工艺，更为骑楼的设计创造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有利条件。丽江花园小区骑楼商业服务街就是最成功的实例。

五、岭南园林，天人和諧

由于岭南气候环境得天独厚，为自然风光、园林建筑和花木绿化三者的有机融合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多留隙地延明月，不筑高墉碍远山”的道理。广州是一个“三朝十帝”的古都。古城南临珠江、北靠云山，绿树红花点缀亭台楼榭，人居环境别具特色。广州园林源于何时？据文字记载，广州园林应首推南越王赵佗（？—公元前 137 年）宫苑。赵佗统一南越称帝后，仿秦皇宫苑，在越都番禺（今广州）大举兴宫建苑。越秀山越王井及歌舞岗（越井岗）、越王台是当时遗迹。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叹道：“榕树梢头访古台，下看碧海一琼杯。越王歌舞春风处，今日春风独自来。”1995 年于广州中山四路发现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不仅正好证实了文献的记载，而且使中国古典园林的最早实物遗存从隋朝（绛守居园地）推前至西汉早期，为研究 2 000 多年前的中国古典园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目前，考古发掘已揭露出御苑的一部分。该部分主要由一大型水池和与之相连的水渠组成。水池居北，呈仰斗状，面积约 4 000 平方米。从池底出土的大量建筑构件可推断，水池之上应建有园林建筑。由水池南端引出的细长石砌水渠，其长约 150 米，渠口宽 1.4 米，深约 0.6 米，由北而南蜿蜒贯穿整个遗址，再由暗渠引入当时的珠江，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曲渠东端连接一个弯月形的石室。石室内发现大量龟鳖遗骸，推测为鼃室。曲渠中段设有一个“斜口”和两个“渠陂”。因为渠底也发现少量龟鳖遗骸，所以“斜口”可能是龟鳖进出水渠的通道。大板石筑成的“渠陂”，应当是用以限水速、涌波浪的简易人

工水景。水渠渠底密铺黑色鹅卵石，其间用黄白色大卵石呈“之”字形点布，可获得“曲池流水细鳞鳞”（苏轼诗）的奇妙景观。曲渠西端有一座石板平桥，长仅1.3米。桥两边均铺有步石，逶迤通向远方。可推想曲渠两岸应为绿草如茵的景象。桥西侧出土有向东倾倒的柱、石、瓦、当等，可能这里是一条游园观赏的步廊。南越国古园林的奥秘还有待人们进一步发掘。

至唐代，广州园林又有了发展，当时荔枝湾被开发为风景区，署名“荔园”。曹松的《南海陪郑司空游荔园》诗写道：“荔枝时节出旌游，南国名园尽兴游。乱结罗纹照襟袖，别含琼露爽咽喉。叶中新火斯寒食，树上丹砂胜锦州。他日为霖不将去，也须图画取风流。”此诗描述的正是荔园优美的园林景色。

公元10世纪，五代南汉皇帝刘龚即位，在南越皇朝的基础上建宫苑，其幅员之大几乎占了大半个广州。已知其名的有宫殿26座、苑圃8处。其苑圃分别命名为：南宫药洲、甘泉苑、芳华苑、显德园、华林园、昌华苑、望春图、苏氏花园。今南方戏院内九曜园就是南宫仙湖药洲的遗址（常聚方士于此炼药得名），现存九曜石和宋代书法家米之章药洲题字和诗刻。药洲依傍当时人工开扩的西湖，引入江南造园技艺，用花、石点缀湖洲。因置有名石九座，取天上星宿之意，故又称“九曜石”。园林宫阙、奇石名花与湖光水色相辉映，烟波浩淼，如蓬莱仙境。至明代，“药洲春晓”成为羊城八景之一。昌华苑在今荔枝湾，泮塘有花坞，每年荔枝熟时，在此举办“红云宴”，有“十里红云，八桥画舫”之美誉。甘泉苑在城北，广建宫室楼台，遍植奇花异卉，曲径流水多丽人。据载，刘氏皇帝朝夕与妃嫔宴游于此，宫娥梳妆，掷隔日残花于水中，落英缤纷飘浮并经苑内一木桥下，故名“流花桥”。

东晋期间佛教传入广州，唐代伊斯兰教传入，明清时期又传来天主教和基督教。时兴建观设庙，于是寺观园林兴起。广州城内的光孝寺、六榕寺和白云山寺庙香火鼎盛，游人甚众。清初光孝寺、华林寺、长寿寺、海幢寺、六榕寺因以园林取胜，被誉为广州五大丛林。

宋代，自然风景颇为民众赏识。人们结合山林泉石兴建忠堂贤祠、诗社书院、精舍幽园、贤坟祖茔、亭台楼阁、桥廊庑榭，供民间游憩、祭祖、习文墨诗书、樵耕渔读。这些活动环境构成朴实素秀的园林。特别有代表性的景观还首次被命名为羊城八景而载之于文：扶胥浴日、石门返照、海山晓霁、珠江秋色、菊湖云影、蒲涧廉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这种大众性的风景园林审美活动代代相传，形成优良的地方传统，使各朝代都注意建设自己的“八景”。

明清时期，达官贵人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崇尚“万物皆备于我”，用中洋结合的手法，构筑了不少私家庭园。较著名的不少于60余座。如湛若水的湛家园、黄哲的听雪蓬、郭龙的岳苑园、李淮的东园、叶氏的小田园、张维屏的听松园以及伍氏花园等。

这些园林，有江南园林的基础，在发展过程中，融入刚直挺拔的阳刚之气，更适合岭南的气候特点，反映出岭南文化民俗民风的轻巧紧凑、通透的风格。岭南园林经过从皇家园林、士大夫贵族园林到富绅私家园林发展的历程，清代达到了顶峰。其中在广州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海山仙馆、小画舫斋等。

清代的荔枝湾，是上下西关涌交汇之处，依傍珠江，水土肥沃，因广植荔枝而得名。当时这里仍是城郊，水田里种植着莲藕、马蹄、菱角、茨菇、茭白等作物，是谓“泮塘五



图 1-4 残存的清代私家花园——小画舫斋之家庙一角

秀”。“白荷红荔半塘西”、“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等广为流传的诗句，就是对当时大景观的生动写照。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就是座落在这一带的一座著名的私家园林。

潘仕成（1803—1873），父正威，祖父有亮。为十三行行商。其家族被世人列为清代广州首富。道光十二年，潘仕成考顺天乡试副贡，同年钦赐举人，于此前后购得荔湾“唐荔园”（阮福 1824 年游园时题名）。著名画人陈务滋于道光四年绘有唐荔园画两幅，两广总督阮元题跋，被视为承唐代咸通园之风景园林。潘氏于此经营海山仙馆四十年，惜于同治十一年废没。

可以说海山仙馆的前身为 1000 多年前的唐代“荔园”，以“海上神山仙人旧馆”得名。该园建成于鸦片战争前，其活动与中国近代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该园存续的 40 年中，接待中外来宾无数。由于主人是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与传播者，园内的建构均体现出我国少有的大型文化家园的卓越风姿。

“海山仙馆”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有山有水。园内有接待嘉宾的阁、有举办文娱酒会的贮韵楼、有储藏古籍书画的文海楼，多以回廊连接。湖池亭榭，地广园宽，充满“红云弥盖，日夕荷香”的醉人情景。园内有三山，皆由挖湖担土垒石而成。高者筑有石道，可拾级而登；低者亦有奇石峥嵘，青翠欲滴，繁花竞放。正如楹联所撰：“如画林亭花四壁，真仙楼阁海三山”。道旁有鹿洞，禽舍放养着珍禽异兽，一派生机景象。三山有二塔，一为六角五层大理石砌，一为圆柱形。廊桥十余座，或平或拱，曲直多样，千姿百态，有南国“圆明园”之誉。海山仙馆利用当地的特种植物，使“堤上红荔”、“水里白荷”、“庭中丹桂”、“楼畔竹影”相互衬托，形成一种疏落有致，曲径通幽，四时花木，美不胜收的意